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田纪云 著

新华出版社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田纪云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田纪云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5011-8654-9

I. 改… II. 田… III. 改革开放—成就—中国 IV. D6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5555 号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作 者：田纪云

责任编辑：王婷 张程

封面设计：伍民力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http://press.xinhuanet.com> <http://www.xinhupub.com>

邮 编：100040

经 销：新华书店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960mm 1/16

印 张：35

字 数：48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1-8654-9

定 价：59.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010)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010) 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0312) 2838225

走进中南海之前的日子（代前言）

我是1981年初，即改革开放初期走进中南海的，是改革开放决策的参与者和改革措施的实践者之一。在回顾改革开放是怎样走过来的之前，我想首先简要介绍一下走进中南海之前的日子。

我的家庭

1929年6月12日（农历五月六日），我出生在山东省泰安县西南乡田家东史村（1950年这个乡改为汶阳镇，随第一区划归肥城县管辖）。田家东史村坐落在山东省泰山西南约40公里的大汶河北岸。这里是泰肥山区中仅有的一片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人所称“汶阳之田”即指此地。

我的家庭在当地算是个名门望族。我的祖母生下我父亲兄弟姊妹11人，7男4女，1男1女小时夭折，活下来9个，6男3女。抗战前，全家人口已达32口之多，且在一个锅里吃饭。家中有我的曾祖母（曾祖父英年去世）、祖父母、我的父辈兄弟姊妹及我们这一代。祖父是当地一位知名人士，当过乡里正（即乡长），知书达理，崇尚文化，为人正直，不信神教，不崇洋人，乐善好施，广交朋友，思想比较进步，重视儿孙们的文化学习。我的父亲田景韩（原名田锡琦），在兄弟中排行老大，1927年就读于济南省立高级师范，以后又在泰安县城里教书。我二叔田晋臣（原名田锡廷），继我祖父在当地当乡长。三

叔田锡贞在家经营一小中药店。四叔早年夭折。五叔田锡珉、六叔田锡琰、七叔田笑海（原名田锡珊）3人在家务农，他们有的上过中学，有的上过小学或私塾，都有一定文化知识。我的父亲，在父辈中是学历最高的。他性格耿直，为人憨厚，但不善交际，一生在曲折坎坷中度过。他在泰安县城教书期间，我的祖父、叔父们背后多称他是书呆子，认死理。

“田家军”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长驱直入，未遇任何抵抗，很快就占领了山东的济南和泰安。在山东党组织的领导下，泰西地区抗日烽火四起。1938年，我父亲和二叔拉起了抗日游击队，父亲任政委，二叔任队长，三叔、七叔和我大哥也先后参加了这支队伍，在泰山南部大汶河一带打击日伪军，被当时泰西人民称为“田家军”。随着形势的变化，我父亲先后任泰西县抗日政府民教局长、冀鲁豫边区聊城专署文教局长、聊城中学校长、菏泽中学校长、冀鲁豫行署文教处教育科长等职。1953年，他在担任菏泽中学校长期间，据说在给学生们上课时讲了江青的什么坏话（后来才知道，是说江青原来不叫江青，叫蓝苹，与毛主席结婚是康生介绍的，并说中央对她有约法三章，不许她过问政治等），菏泽地委书记与他个别谈话时谈崩了，一气之下他辞职回家。1954年，菏泽地委派人又把他请回来，给了他撤职处分，分配到单县中学任教。“文革”中他被调到河南省洛阳市六机部所属柴油机厂的职工中学任教，又因上课时讲了什么“错话”被打成“反革命”。

父亲革命一生却被打成“反革命”，蒙受不白之冤，我帮助父亲写了申诉书，后经平反，办理了离休手续。

我母亲是一位善良贤惠的女性，她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很有教养。她的父亲即我的外祖父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学者，长期从事教学工

作，也是我读私塾时的老师。抗日战争前，母亲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以身作则，勤勤恳恳，很受妯娌们的尊重。父亲参加抗日工作后，不论父亲处境如何，母亲都与之相随，照顾父亲的生活。在战争年代，因父亲与我们弟兄3个都先后参加抗日工作，母亲整天牵挂我们，思虑过多，患上了失眠症。1971年，我刚从“五七”干校调回机关，就将父母亲接至成都一起生活。那时，我们缺乏医疗知识，听人说服安眠药有副作用，千方百计不让母亲吃安眠药，老拿维生素片骗她。她彻夜失眠，万分痛苦，终因心力衰竭于1973年去世，享年68岁。其实，她一个家庭妇女，又不管国家大事，糊涂点又咋的！为什么不让她多活几年！我真是后悔莫及。

1981年，我调到国务院工作后，把父亲迁来北京。他老人家1991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86岁。

少小投奔八路军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年月，周边一些大的村镇也被日本人设为据点，我的家庭多次被查抄。这时我的家人已不能在家正常生活，有的投亲靠友，有的东躲西藏，有家不能回。我随母亲有时躲在外祖父母家，有时躲在大姨家。一次在汉奸带着日本人查抄我家时，我和二叔家长子田纪霞、三叔家长子田纪雯3人都跑到一家近邻躲藏，三叔家比我长一岁的田纪雯被汉奸认出，当场遭枪杀。这时我们在家里再也待不下去了，亲戚家也都怕受牵连不敢收留我们。于是，1941年冬，刚满12岁的我便和二叔家刚满13岁的田继霞一起，由地下交通员秘密护送，离开可爱的家乡，西渡黄河，奔赴冀鲁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参加了八路军，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为了使负担分散一点，我先是投奔七叔任参谋长的独立团当了一名小八路，田纪霞直接去了二叔任厂长的八路军一分区所属抗属工厂。独立团团部的同志对我都很好，我七叔有时让我当通讯员，有时

让我到厨房帮炊事员洗菜，老号长有时拉我去教我吹号。但就是夜行军不行，一上路就打瞌睡，七叔常常把马让我骑，但我打瞌睡会从马背上掉下来；七叔有时把我拴在马尾巴上拉着走，也会打瞌睡摔到沟里去。无奈，半年后，七叔把我送去抗属工厂当了童工。这个工厂主要是为部队生产地雷、手榴弹，也织袜子、毛巾，熬肥皂。在工厂我学会了翻砂浇铸手榴弹弹壳、织袜子等。工厂员工多系工农出身，有文化的不多，我这小学生也算是“知识分子”了，教大家识字、唱歌。干了近一年，组织上认为我们年龄小，又有一定文化基础，可以培养，送我和田纪霞到山东茌平县抗日政府领导的抗属小学上学。这个学校完全是抗日家属子弟，实行供给制。学校没有固定的校址，根据形势经常流动。

这时，正值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根据地大大缩小，我们多次被化整为零充当农民的孩子。中国农民真好，他们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对待我们。日本人一扫荡，就马上要我们穿上他们孩子的衣服去地里干活，拾柴、捡粪，或躲到他们的亲戚家。这期间，我在聊城一带共认了5个干娘。所谓“干娘”，就是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对长辈男性叫“老大爷”，对女性长辈则叫“老大娘”，久而久之，感情深了，就直接叫“娘”、叫“爹”了，并没有举行过什么认干娘的仪式。这时的我，深深体会到，人民群众之于共产党，犹如树之根，鱼之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革命的胜利。80年代，我当了国务院副总理后赴聊城地区考察工作时，曾有意去当年待过的地方看望这些老人，但都早已辞世，只能见见他们的后代。

1945年初，我被保送到冀鲁豫第三抗日中学学习，直到1946年末。第三抗日中学在鲁西南游击地区，学校有时在黄河南，有时在黄河北，经常流动。学校也很少上课，有时听听形势报告，发点教材自己看。大部分时间做群众工作，动员群众支援前线、护理伤病员和征收公粮等，1945年5月我就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我还不满16岁。我一入党，就当上了区队长，发给我一支日本造三八大盖枪，站

岗、放哨、征粮都扛着它，一直扛到离开三中。

在三中，在一次战勤工作中结识了后来成为我夫人的李英华（我们都被派去照顾“二野”第一次陇海路出击作战中的伤员）。她同我一样，出身革命家庭，她的父亲、大姐、大哥都于抗日战争初期先后参加抗日。她与我同年参加抗日工作，先于我到三中学习。她是三中的高才生，考试经常名列榜首，我呢，要么第二，要么第三。那时在根据地有文化的女孩子不多，有不少大干部想接近她，但她都不予理睬，而偏偏爱上了我这个无依无靠、离乡背井的穷学生。李英华的母亲是抗日家属，吃救济粮，经常节省几毛钱给李英华，她就悄悄地给我，实在馋了，就赶集去吃个烧饼，喝碗胡辣汤。

1946年冬，解放战争开始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带领工作组参加朝城县（今莘县）一区的土改与扩军工作，我任工作组组长兼区长。在土改与征兵工作中我立大功一次（动员96人参军），小功两次。其间也曾被借调到朝城县宣传部办油印小报，自编自刻自印。这时我也经常给《冀鲁豫日报》投稿。《冀鲁豫日报》有个编辑叫王效文，是我父亲的同学，对我的投稿，不论用与不用，他都仔细修改后退我，并指出问题所在，要注意什么，对我帮助很大。

1947年5月，我被派去冀鲁豫会计学校学习会计业务，随后我的未婚妻李英华也到会计学校学习。年末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隶属冀鲁豫军区的战勤总指挥部供给部当会计。这是我第二次参军。李英华被分配到冀鲁豫九专署财政局工作。

淮海战役带担架队支前

1948年秋淮海战役打响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带领担架队支援前线。我担任担架营营长，担架营共80副担架，每副担架3个人，轮流抬。担架队员多是老根据地的民兵或农村积极分子，有不少人还是共产党员，有高昂的支前杀敌热情。战斗打得很残酷，部队伤亡很大。

担架队的任务是把包括敌方的伤病员从前线抢救下来，送到野战军医院。担架队队员都具有很高的觉悟，在枪林弹雨中毫不畏惧，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我个人也和队员一样，上前线背伤员。

在担架队完成任务回程的途中，发生了一件令我终身难忘的事情。

我带领的担架队来去执行了5次任务。完成任务返回根据地时，人困马乏，疲惫不堪。有一天，夜幕降临，担架队露宿在离今菏泽市约三四里路的王楼村，一说不走了，大家都席地而睡。我呢，警卫员给我找了一张破席子铺在路边上，又找一块砖头做枕头，我把手枪皮带压在砖头下边，就呼呼睡去。当天亮醒来时手枪不见了。我非常恐慌，几乎问遍担架队的所有人，都说没有见。第二天，我带着十分惶恐、沉重的心情回到战勤总指挥部。当晚就向党小组作了检讨。我们会计科的科长崔子平要我写书面检查，以便报告指挥部领导处理。第二天，我正在写检查时何光宇司令员（老红军，开国少将，建国后曾任贵州军区司令员，兰州军区副司令员）把我找去谈话，把我臭骂一顿，说，你这浑小子，怎么没把你自己丢了。我哭着请求司令员处分我，什么处分都行，但千万别开除我。我说，我一家人都在外干革命，我回家会饿死。司令员说，你去写检查吧！我写检讨的过程中，崔子平科长走来劝慰我。他突然问我，小田，昨天司令员骂你了没有？我说骂了，骂得很厉害。科长立即说，小田，你别哭，司令员骂你，就可能不会处分你。崔子平科长告诉我，当他骂你的时候，可能是信任你了，要用你；如果他对你客客气气，给你倒茶，那你可能要倒霉了。他还举了多个例证。我将信将疑。大概是第三天，命令下来了，提拔我为正营职会计，总务科为我配备马一匹，司令员还让他的警卫员送我一支德国造手枪。

当时部队有个规定，当了营长以上干部以后可以结婚，但对方必须是有工作的，家庭妇女不能随军。因为快要渡江南下了，所以我与我的爱人于1948年11月14日就结婚了。这件事很快传开了，战勤指

挥部的人都说，小田“因祸得福”，丢了一支枪，还升级，捡了个老婆。事后我知道，战勤指挥部党委研究，念我年纪小，思想纯洁，又出色地完成了支前任务，作出了提级、配马的决定。

从1941年到1948年，我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8年中，我当过兵、做过童工、搞过土改征兵、带过担架队等，这些经历既锻炼了我独立工作的能力，也造就了我坚强的毅力和刚直不阿的性格。8年砥砺，使我由一名小八路成长为一名南下干部。

渡江南下和西进

1948年冬，组织上决定我随军渡江南下。那时人们认为渡江南下，要打大仗、恶仗，凶多吉少，是九死一生，所以，对南下干部都放一个星期的假，准许回家看看。从菏泽县郊区驻地到我的老家，大约有150多华里。那时想老娘心切，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起早贪黑，一天就赶到了家。给老娘带了两斤菏泽特产柿饼。母亲见儿子回来，兴奋不已，彻夜不能入眠。我在家待了3天，第四天回去了。临行时母亲给了我两双她亲手为我做的布鞋，叫我在南下路上穿。但我始终没舍得穿，一直把两双布鞋带到贵州，新中国成立后才穿。回到菏泽，在外地工作的大哥也来为我送行，并在菏泽县城里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新中国成立后大哥把照片给了我。我三弟也来送我，我留给他一个笔记本，写了几句留念的话。

1949年3月，南下干部组成南下支队，我作为二野五兵团供给部的会计，被编入南下支队供给部。在我的请求下，组织上批准我爱人李英华也调入南下支队供给部当出纳，一起南下。南下支队在距今菏泽市3华里的晁八寨集中学习，听取各级领导同志报告。

4月初南下支队走上征途。临行前，我爱人的母亲给她一块银元作为纪念，这块银元我们一直保存着。南下干部的行李非常简单：一床被子（两斤重）、一双鞋子、一个茶缸、一条毛巾、一个布制挎包，

还有一块两尺见方的油布，下雨当雨伞，不下雨用来打背包。

4月10日左右南下支队来到安徽合肥市，等待渡江。这时，我才发现我爱人怀孕了，呕吐，吃不下饭。但不敢声张，否则会被送回北方。

我们住合肥市郊区，在这里，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女人下地干活，挑粪、插秧、平整土地，什么都干，男人在家烧饭、带孩子。我问老乡，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叫“养汉”，女人养活男人，能养汉的女人才嫁得出去。看，安徽女人真能干！

组织上交给我和我爱人李英华的任务是押运两马车准备在敌占区用的银元。渡江后南方已进入雨季，行军路上，阴雨连绵，道路泥泞，逢沟过坎，马车过不去，我们就同押车战士一起，把银元一箱一箱扛过去，然后再装车前进。晚上宿营后，我和李英华轮流睡在马车上，以确保银元的安全。历尽千辛万苦，4月中旬我们终于胜利到达江西上饶，我和爱人也圆满完成了任务。

到江西后，我被分配到赣东北行署财政处当总会计，我爱人也在财政处当会计。财政处被分配在刚接收的上饶一家私人银行办公。我同爱人住在一间终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这地下室，老鼠猖獗，夜间熟睡后老鼠经常来啃我的脚后跟。那时我还不满20岁，身体健壮，性格活泼，业余时间经常组织财政处年轻干部打乒乓球，唱革命歌曲。

同年9月，组织决定南下支队的原班人马组成西进支队，随二野五兵团西进贵州，解放大西南。决定作出后，财政处迅速与赣南行署财政处进行交接。西进支队9月9日由上饶出发，11月26日到达贵阳市。西进途中，到了湖南湘潭毛主席的家乡，有一批女同志（包括我的爱人）要生孩子，另有一些女同志因身体不好，行军有困难也得留下来，故西进支队在湘潭设了留守处照顾这些女同志。10月13日，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在湘潭一家教会医院。孩子出生的第二天，我买了两只老母鸡去医院看望我的爱人和孩子，未料一进病房门就碰见了一个外国神父（哪国人不清楚）。他疾言厉色，叽里咕噜把我训斥一

通，旁边人说，他说我不该把鸡带到医院。那时，我是刚满20岁的血性小伙子，堂堂解放军，哪受得了“洋人”这恶气！一时怒容满面，朝洋人瞪了几眼，不由自主地用手拍了拍腰里别的手枪。但一想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就抑制住了自己的火气，没说什么。幸好一位护士把鸡提走了。后来听我爱人说，两只鸡医院还是给她炖来吃了。

这个孩子，生在湖南，长在贵州，故取名“田湘黔”。

从江西上饶到贵阳，除九江至武汉坐一段木船外，一路步行。湖南境内的雪峰山真是够高的，爬一段就得停下来喘口气。整个西进支队，就后勤部有一台烧木炭的汽车，是拉物资的，谁也不能坐。这是一台用摇把子发动的车。这车，现在看来很落后，可在当时很先进，当地农民都没见过。一天，汽车的水箱漏水，当地农民很惊奇，问：“这乌龟壳怎么还会撒尿？”

在行进到接近贵州省境的时候，宣传队沿途刷出了这样的标语：“前边就是贵州地，群众纪律要注意。”杨（勇）、苏（振华）首长马上批评下来说，这口号是错误的，难道在湖南就不注意群众纪律吗！以后这种标语就不见了。

遭遇土匪

贵州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土匪四起。1950年初，土匪曾打到离贵阳市只有7里路的“七里桥”，被解放军击退。

当时的贵阳市，最缺乏的是日用工业品，如布匹、盐巴等，省军管会负责人临时调我到军管会办公室负责物资调运工作。七八月间，我带一个武装排和十几部大卡车前往重庆运输布匹和盐巴，回来时走到贵州桐梓县一个叫七十二道拐的地方，只见原本在山坡上砍柴干农活的人，突然举起枪和大刀、长矛蜂拥向车队冲来。遇上土匪了！前边的车刚过去，我坐在最后一部车的驾驶室，拔出手枪向土匪射击，

连扣几下扳机，怎么也打不响。我急了，命令驾驶员：“冲过去！向他们身上撞！”驾驶员一踩油门，冲着土匪猛冲过去。土匪见势不好，慌忙躲闪，车便冲了过去。

这次与土匪的遭遇战，我们一部汽车被打坏，物资也损失了一部分。回到贵阳后我气犹未消，立即让军械员检查手枪，原来是撞针不够长。

在随后另一次运输物资时（我未去），差不多在同一地方与土匪遭遇，这一次牺牲了两个年轻同志，一个叫白向雪，一个叫小孟，都是南下干部。

办学育人

贵州解放初期，急需大批干部，1951年至1953年，我先是被派去由刘伯承任校长的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贵阳五分校任班主任，继而又被派去办财政学校，任组教科长，后改为财政干部训练班，由我任主任。我既是行政干部也是教员。领导也知道我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但癞子里选将军，选到我了。赶鸭子上架，没办法，只有服从。我下决心读书，比较系统地攻读马列毛的一些基本著作，学《资本论》，学哲学，学政治经济学，学科学社会主义，学党史，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都是我编写讲稿的主要参考材料。自编自讲，现炒现卖。面对刚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他们听什么都新鲜，还挺受欢迎。所以，我在贵州可谓“桃李满天下”。如今，我的学生们早已退休，但对我这个当年的“老师”非常亲切，叫“老师”，不叫官衔。

严厉的厅长王维

1953年后，我一直在贵州财政厅工作，由秘书、科长、处长、办

公室主任干到副厅长。厅长王维，北大高才生，1947、1948年我在冀鲁豫战勤总指挥部当会计时，他就是供给部长，我的顶头上司。他脾气暴烈，爱训人骂人，工作要求苛刻。当年不像现在大学生多如牛毛，那时我一个中学生就算得上“知识分子”了。我在他手下当秘书科长、预算处长、办公室主任多年，主要文稿多由我起草，经常是下午下班时布置写东西的任务，第二天早上上班就要交卷。他一看不对劲，就把你骂得狗血淋头。即使陪他到财政部开会，当着财政部领导的面也照骂不误。战争年代那么艰苦我很少哭过，但这些年我却经常为完不成任务或任务完成得不好而哭泣。我起草的不少文稿上，都有我的眼泪。当时我很怨恨他，但事后想一想，我在他手下学了不少东西。“严师出高徒”嘛。我后来的成长同这位厅长的严格要求有一定关系。

“大四清”受批判

1964年初我被提升为贵州省财政厅副厅长。1964年冬贵州开展“大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中央和西南局派出强大工作团赴贵州。工作团对贵州工作的评价是“三关未把好、一个根子未扎正”（“三关”是：镇反、土改、农业合作化；“一个根子未扎正”，指未在贫下中农中发展党员），对苏振华、杨勇时期的贵州工作基本上是全面否定的。工作组走到哪里就说哪里烂了、修了，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我在贵州财政厅被打成“田、冀（民）、李（艾青）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我们三人都是财政厅副厅长，在行政职务上排序是李、冀、田，我在后，我也最年轻，但“反革命修正主义”我却成了头子）。

我为什么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主要是三条“罪状”。一条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曾支持后勤部门包了一个为食品公司加工豆腐的活，加工出来的豆制品归食品公司，豆腐渣留给机关食

堂养猪，除给食堂改善生活外，还不时地给机关干部分点肉。在那一年难得吃几次肉的岁月，十几头猪可给机关职工解决了大问题。经常给大家分点肉，大家对我这个办公室主任真是感激不尽。但到了“四清”时却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另一条罪状是，根据省委的决定，经党组研究同意，拿了70余万元人民币，在贵阳的花溪风景区盖了一幢别墅，说是准备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去时住的。这也成了我的一条罪状。其实，直到我调离贵州，也没有见过这幢别墅是什么样子。

第三条罪状是说我搞“假决算”。财政厅为了处理大跃进、大炼钢铁造成的遗留问题，在问题未核实前在“决算”上先按各地报的数字预留了几百万元，待问题核实后逐笔拨付，防止错漏。但有人硬把这实事求是的做法说成是“假决算”。当时的“四清”工作组组长公然说：“你们搞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而是美利坚合众国的财政！”

三条罪状，使我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头子”。整天大会批，小会斗。

我爱人本来是财政厅人事处副处长，因我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要立即把她调离，她不想走，要等我的问题作结论后再走。我动员她，走吧，不然你整天看着我挨斗，心里也不好受。就这样，她被调到省农业银行工作。

在我被批斗的日日夜夜里，我感到莫大的委屈。

共产党培养我长大、进步，从贵州解放那天起就在财政厅工作，算得上是财政厅的元老了，也是少壮派，起早贪黑，不分昼夜，是干活最多的，而且从不谋取任何私利，可说一尘不染，三年困难时期也没有多分过一斤肉，就连到北京开会都乘坐公共汽车，因公、因私分得一清二楚，因公的报销，因私的个人出，不占公家一分便宜，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了呢？有的人还无中生有、胡编乱造，说见我买了两个木板箱子，准备逃去台湾。也有人说我是中

国的“小赫鲁晓夫”，等等。我想不通，常常夜间暗自哭泣。

我似乎成了瘟神，谁也不敢接近我。我最亲近的朋友也躲着我，有时躲在暗处远远地望望我。我也不接近任何人，怕别人受牵连。这时，唯有我的爱人李英华整天陪着我，经常带我下饭馆吃碗面条或者买两个包子吃。她鼓励我：“把精神振作起来，不要灰溜溜的，拣你最好的衣服穿上，给他们看看，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呀，你成不了反革命！”

我的4个孩子原都在机关食堂搭伙，因受歧视也不敢去了，只好把他们送到我七婶子家吃饭。我七叔把我引向革命大道，我这位婶子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使我终生难忘。

1965年初，中共中央下达了据说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文件主要精神是纠“左”的，强调看待干部要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要注意团结95%的干部，注意团结95%以上的群众，防止逼供信等，从此停止了对我的批判，也没说平反，派我去贵州贵定县农村搞“四清”，代理县委书记（挂名，那时党委一把手叫第一书记）。到贵定县后，我被分配到该县沿山区蹲点。该区是苗族、布依族聚居区。区长向我介绍说，苗族家吃的好点，但不大讲究清洁，布依族家讲清洁，但吃的差点，他问我，你愿住哪里？我说，就选个贫农布依族家住吧。就这样，我被安排在一个布依族的贫农家庭里。这个家庭三口人，除两口子外，还有个读小学的女儿。他们给我腾出一间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就这样，我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近半年。除每月按规定缴纳伙食费外，每到星期天我另外给房东两元钱，买点肉，改善一下生活。这段时间，我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学会了水稻的育秧、插秧、薅秧、踩秧和收割等农活，增加了不少农业生产知识。同时，也亲身体会到基层组织在农业生产上的瞎指挥给农民、农业造成的灾难。

我结束搞“四清”回到贵阳市后，立即给当时任贵州“大四清”

工作团副团长的中共西南局书记李大章写了一封申诉信（团长是中央派去的一位叫钱瑛的女部长），未料，李大章第二天就约我到他的住地谈话。我将蒙受冤枉的情况如实相告。李大章听后可能觉得确实搞错了，大概也看我还年轻，有一定工作能力，他回到西南局后，立即派西南财办主任张韶方来贵州对我进行考察并与我谈话。张回去不久，西南局组织部就发来调令，调我到西南局财办任财金处副处长（西南局的处系厅局级，财金处处长是侯千之，原任财政部文教司司长），官复原职，还给我提了工资级别。这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因祸得福”。

通过贵州的“大四清”，我认识了两种人：一种是当官不负责任。这种人的特点是把功劳归于自己，问题推给别人，哪怕自己决定或同意的事也不承担责任，树叶掉下来都怕打破脑袋。另一种人是伪君子、两面派。这种人的特点是平时对人笑嘻嘻的，和蔼可亲，经常拍着你的肩膀吹捧你，听起来酸溜溜的，但运动一来，就凶相毕露，整起人来可“勇敢”。在那种环境下“上纲上线”还可谅解，可耻的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必欲置人死地而后快。这两种人灵魂都肮脏丑恶，尤其第二种人更为可恶！我仔细观察，这种人在“文革”中如鱼得水，更是表演得淋漓尽致。

躲过“文革”劫难

1966年初春节过后我到中共中央西南局财办报到。对财政金融工作，我可以说是驾轻就熟，很快进入角色。我和处长侯千之本来就是熟人，工作配合默契。但工作尚未展开，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贵州省财政厅的造反派揪回贵州批斗、陪斗（陪省委书记周林接受批斗）。我在贵州接受批斗期间，住在贵州省交际处的招待所，交际处处长恰好是同我一起渡江南下的老战友